

# 对中国比较文学教材观的反思

——兼及王向远与夏景之争

姚建彬

〔摘要〕近20年来,比较文学的教材建设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吸收、借鉴、融汇到自创的发展过程。由于受到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教材与学术著作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模仿借鉴有余,而自创原创不够的倾向。这种状况,不仅源于比较文学自身的开放性学科特点,而且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实际,因而有着不言而喻的合理性。破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的教材与学术著作的传统二元对立关系,在遵守本学科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在界定教材和专著两者关系过程中存在的“等级观念”与“精英意识”,区分“广义教材观”与“狭义教材观”、“静止教材观”与“动态教材观”,不仅有助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教育问题与现状的洞察和反思。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材观;广义教材观;狭义教材观;静止教材观;动态教材观

〔作者简介〕姚建彬,1972年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5)。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3)02-0211-04

最近数年来,国内先后出版了好几种引发争议的比较文学教材。<sup>①</sup>这些教材出版之后,我们既看到了对其予以褒奖、称赞的文章,同时也看到了围绕这些教材而展开讨论、商榷的文章。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历史只不过短短的20来年。直到1984年,我国才出版了由卢康华、孙景尧合著的《比较文学导论》<sup>②</sup>。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1984年以后各种有关专著及教材的陆续出版”,成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最突出的成绩”(1)。

在我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中,以一人之力单独完成的教材所占比例不大,合作似乎成为了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和学科概论教材建设中的通例。<sup>③</sup>因此,当王向远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在这样一种独特语境中出场时,其所引起的关注和激发的争论就颇值得关注。

王向远的这部《新论》之所以较为引人注目,至少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第一、全书只划分为“学科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三章,结构体例较为新颖简练;第二、针对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这部《新论》提出了一些颇具“颠覆性”的“新”观点。自问世以来,由于《新论》在学术观点

① 笔者所谓这些教材引起争议,大大有别于社会新闻中的轰动效应,更与娱乐新闻中的诸多“八卦”杳不相涉,而主要是指这些教材自行世以来,学界围绕它们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如比较文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对象论”、“方法论”、“发展论”、“学科史论”等等,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所表现出的差异而展开的商榷或争论。笔者寓目所及,这些引发争议的教材有如下代表:1.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修订版。本书第一版曾荣获1992年国家教委(今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国家级“全国优秀奖”,修订版于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并在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荣获教材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2.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之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3.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比较文学课程基本教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4. 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5. 方汉文主编《比较文学基本原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自中国比较文学进入复兴期以后问世的所有比较文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都在引发争议之列,本文之所以未将所有这些教材和专著全部纳入讨论的范围,除了自身学识和视野等因素的限制外,更重要的考虑是本文的论旨已决定了对论述对象的选择。笔者希望在其他场合弥补这种缺憾。

② 参见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值得关注的是,与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问世差不多同时,先后涌现出了多部以个人专著形式刊行的比较文学教材,如张哲俊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弘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方汉文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等等。有迹象表明,以个人专著形式问世的教材,将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历程中的教材建设领域的重要趋势。王向远、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中的好几部著作,严绍盪在为其主编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所撰写的“出版总序”中预告的十余种著作,皆为这一趋势的明显表征。



上的个人性、创新性和“颠覆性”,该论著在学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鼓励赞扬之声与商榷争议之态皆有其踪迹。<sup>①</sup>

王向远认为,自打近几年出现编写比较文学教材的热潮以来,个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有些多人合作的教材只是杂凑成书,在学术上未见进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较新的学科,竟也出现了像有些传统学科中有人所指出的“三百种教材如出一辙”的苗头,这恐怕不是比较文学学术繁荣的迹象。<sup>(2)</sup>

王向远的这一主张,在学界引发了一些争议。2003年第3期的《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了署名夏景的文章——《教材编写与学术创新——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该文在肯定王向远学术探索意识的大前提下,针对王向远的教材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夏景认为,王向远提出的“只有好的学术著作才配用作教材”这一主张,“未免把事情推向极端了”<sup>(3)</sup>。为了纠“偏”,夏景提出了自己对教材和专著两者关系的界定,认为“好的教材有可能同时成为一部好的学术著作”,“但好的学术著作未必就是一部好的教材”;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两者所负的使命不同,教材负有把某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或理论)全面传授给学生的责任,而专著只要把作者本人的学术创见阐述、论证清楚即可完事。

针对夏景的质疑和纠偏,王向远作出了回应。<sup>②</sup>王向远认为,自己提出的“只有好的学术著作才配用作教材”这一看法,与夏景从中推导出的“好的学术著作就是一部好的教材”这一观点,“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判断命题,稍有逻辑学常识的读者一望可知”<sup>(4)</sup>。在王向远看来,凡有资格作教材的,都必须具有“学术著作”的品格,而且是“好的学术著作”的品格,那种拼拼凑凑、“只编不著”的东西,决不能算是“好的教材”,因为“好的教材”只能从“好的学术著作”中产生。从王向远的上述主张不难推导出如下命题:好的学术著作≠好的教材;并且,好的学术著作>好的教材。

上述两学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触及了长期困扰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教育发展的教材观问题。

—

夏景和王向远两人之间的争论,不仅仅源于对“教材”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争论部分地暴露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教材观上存在的某种误区。事实上,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教材这一概念可以进行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就广义而言,天地万物,莫不可以成为教材,岂独文字著作然?!就狭义而言,教材仅指专门学科的课程内容表述。

据《现代汉语词典》,与“教材”这个词相关的词条及解释如下:1.教本:教科书。2.教材: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等。3.教程:专门学科的课程(多用做书名)。4.教科书: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在这四个相关词条中,第二个词条“教材”的释义比较通行和常见,这显然就是一种狭义教材观的集中体现。

除了区分广义教材观与狭义教材观之外,我们还应该区分静止的教材观与动态的教材观。无论是从理论上考量,还是从实践来检验,这种区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持静止教材观的人认为,“教材只是归纳已有的成果,不必有自己的学术创见”。静止教材观论者之所以有上述看法,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教材中表述的知识都是业已公认的、定型化的。进而言之,某门学科的教材就等于该学科的全部知识。由于受这种教材观的支配与指导,我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本本主义”和“教科书主义”,在有些学科领域,甚至出现了一部教材沿用数十年的“怪现状”。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教育主管机构习惯以行政命令指导全国的教材编写工作,致使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都出现了“万人一书”、“千校一书”的“大一统”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便难免出现一本教材在课堂里使用“十几年”甚或“几十年”的情况。相应地,该学科任课老师的讲义也表现出“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如一日的“超稳定性”。在这样的统编教材和超稳定性讲义的“征服”下,教师成为宣讲教材的“机器”,学生也相应地沦为学教材的“机器”,致使他们在知识结构、



9 771001 619003

<sup>①</sup> 对于王向远这部《新论》的特点和价值,学界已有评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相关文章有夏景的《教材编写与学术创新——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费东书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原创性思考——读王向远教授〈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等。这两篇文章均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另有张弘的《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读后》,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陈春香《一棵绿色的生命之树——简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载《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见王向远《逻辑·史实·理念——答夏景先生对〈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思维方式、答题思路、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或“雷同”现象。若深究起来,以前频频为各方批评和质疑的“填鸭”式教学也与这种教材格局难脱干系。不仅如此,在静态教材观指引下的传统教材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分低能”学生的成批出炉。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活生生的教育活动,却变成了围绕“一言九鼎”的教材打转转的无聊游戏。

动态的教材观则认为,一本教材不仅可以总结某学科的既有知识,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阐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可以对该学科的既有概念、范畴、命题,甚至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提出质疑和批评。持动态教材观的人认为,不应该人为地给学科划定禁区,而应该在各个学科领域鼓励和倡导反思、质疑、批评、探索的精神,使学科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动态教材观不仅义无反顾地把“既有”、“现成”和“公认”的纳入自己的怀抱,而且对“新课题”、“新问题”、“新方法”保持一种信心满怀的包容与理解的姿态。如果这种教材观能够赢得更广泛的认同,我们就有希望读到或使用到越来越多富有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的教材。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创新就有好教材,一探索就能给学科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进步,但是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本身是值得予以积极提倡和大力肯定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主张引入广义的教材观与狭义的教材观,以及动态的教材观与静止的教材观这种区分,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总结和回顾<sup>①</sup>,对未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展望和指引。<sup>①</sup>

### 三

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教材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动态、开放态势。这种选择,不仅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也内在契合着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的基本特点。从长远来看,今后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恐怕会越来越更多地以个人专著的形式问世。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

的全部工作,也不意味着未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适度调整后的“静止教材观”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

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都源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详尽而深入地介绍、评述国外比较文学的已有成果,它的流派、范畴、概念,它的学者、著作,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等等。对于一部比较文学的教材而言,如果能够准确、翔实地介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当前的、历史上的、大家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本学科既有的学术成果,这就已经大体合格了。这种介绍、引进的工作本身对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援引外来的学术资源,正是以跨文化为旨趣的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 and 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一个从借鉴、吸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间进程而推进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索和多人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弥足珍贵。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我们应该对所谓“创新”、“原创”之类看似激进实则可能偏离学术发展规律的主张保持谨慎的态度。当前,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前的任务,似乎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在于为了吸引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毋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翻译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可比性、影响与创新之关系,等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效的探讨,在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基础上<sup>②</sup>,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 四

还有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教材的实际应用价值问题。从上述考量出发,目前应该更加慎重地考虑比较文学教材的分层问题。实际上,在

<sup>①</sup> 乐黛云先生在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已经对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与理论建设进行了重要评价。参看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尤其是第8-9页。此外,2005年8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比较文学教学研讨会(山东·威海)上讨论了20余种比较文学教材。

<sup>②</sup> 在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所做发言全面回顾了中国比较文学20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对比较文学观念的推进”、“文学人类学和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现代诠释”、“关于翻译文学的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关于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新进展”、“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关于东方地区文学的研究”等七个方面堪称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开拓与收获”。参看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教材的分级与分层上,有学者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陈惇和刘象愚两先生除了合著那本影响深广的《比较文学概论》外,还主编过专供中小学教师培训进修使用的《比较文学》<sup>①</sup>,从容量到深度都比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有了很大的浓缩,有助于在中小学普及比较文学。<sup>②</sup>张弘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为了适应其所在单位的网上教学,根据其讲义修订而成的一部以网络大学学员为教学对象的配套教材。

除了这种针对不同教学形式和不同培养对象而问世的教材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同一个层次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教材。

不可否认,作为教学主体的一部分,学生在综合素质、自学能力、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我们应该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差异等因素而“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用不同水平的教材。正因为有上述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我们更加有必要大力倡导多样化的教材观,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允许每一种教材鲜明地凸显自己的独立性,而不要太过担心所谓的无序与混乱。

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样的主张太过宽容,但是,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宽容并不等于没有观点、倾向和原则,更不等于否认原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致说来,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如果是概论(有人也用“通论”)性质的教材,就应该对比较文学的对象、方法、学科特点等有基本的共识,这一点,对于那些极力标榜个性色彩的、以好的学术著作而充当教材的著作亦不例外;二、专门论述比较文学某一领域,如“文类学”、“形象学”、“主题学”、“译介学”、“比较神话学”等的专门著作,必须在确认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展开自身个性化的探索。总之,无论是概论性著作,还是专著,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或曰规范、原则),如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如何跨越,它最终研究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关系,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无论比较文学的领域如何拓展,都必须坚守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为归宿这一基本原则。在坚守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这一大

前提下,再来谈动态而多样的教材观,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我们应该在包括比较文学教育在内的所有中国教育领域,尤其是教材建设领域,推行一种真真正正的“因材施教”的原则,破除教材建设领域的等级观念、精英意识——既不囿于任何既定的模式,又不否认一些基本准则,从而为那些充满独特性和原创精神的教材的出版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学生和教师都有更多灵活而自由的选择空间。人为地抹煞分歧、对立,甚至争议,既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不是真正的教育所希望获得的结果。我们要相信,无论是教师和学生,都有足够的能力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教材。当然,要使多元教材观得以真正落实,还必须做点其他辅助性工作,如以教育部委托的形式,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面成立一个教材指导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满足不同教学层次要求的教学大纲,由各院校自行确定自己的教学要求,并据此选择相应的教学大纲,各院校按照选定的大纲来编写适合自身层次需要的教材:既允许有的院校采用极具创新特色和原创性的个人学术专著作教材,也允许有的院校采用多校合作、多人合著的书籍作教材;既允许有些院校完全采用外文原版书为教材,也允许完全“国货”的存在,真正体现“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多元选择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才会赢获较此前更加宽松、自由的氛围,从而有望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势。

(参考文献)

- (1)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 (2)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页。
- (3) 夏景《教材编写与学术创新——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 (4) 王向远《逻辑·史实·理念——答夏景先生对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 (5) 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瑞弘】

<sup>①</sup> 参见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sup>②</sup> 关于在中小学引入比较文学的可行性、必要性等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的讨论。可参看陈惇《关于比较文学与中学教育的思考》,陈惇编《跨越与会通——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论文选》,第142-148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另外可参看王明芳《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可行性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0年第2期。吴华宝《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课中的实践》,《安徽比较文学信息》1990年第1期。